



释江南丛书

振衣千仞

江南文化名人

刘士林 查清华 等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释江南丛书

振衣千仞

江南文化名人

刘士林 查清华 等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振衣千仞:江南文化名人/刘士林等著.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
(释江南丛书)
ISBN 978-7-208-09203-7

I. ①振... II. ①刘... III. ①文化—名人—简介—华东地区 IV. ①K825.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44889号

责任编辑 苏贻鸣

美术编辑 杨德鸿

装帧设计 蔡传生 杨紫莘 应文玺 蔡新华

吕逸伦 白浩哲 徐秀庆 奚静

毛宇龙 徐耀民 周泉虎 杨新远

技术编辑 姜华生

· 释江南丛书 ·

振衣千仞

——江南文化名人

刘士林 查清华 等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锦佳装璜印刷发展公司印刷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17.25 插页 2 字数 241,000

2010年7月第1版 2010年7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08-09203-7/G·1352

定价 43.00元

释·江·南·丛·书

编委会

总策划兼顾问：王仲伟

顾 问：夏晓梅

主 编：俞惠煜

副 主 编：刘士林

编委会成员：

居阅时	查清华	仲富兰	袁志平
杨森耀	苏贻鸣	胡晓明	梅新林
王卫平	何承伟	陈 江	刘世军
吕 敏	宋道胜	王建修	苏会华
徐普良	于晓芹	常咏梅	

特 别 鸣 谢

上 海 东 方 青 年 学 社
重 庆 长 庆 集 团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上 海 秋 钰 贸 易 有 限 公 司
上 海 神 源 企 业 有 限 公 司

对本丛书的慷慨资助

上海市现代管理研究中心现代文化艺术研究所
夏征农民族文化教育发展基金会

总序

上海市现代管理研究中心现代文化艺术研究所与夏征农民族文化教育发展基金会请我为他们合作进行的《江南文化的当代传承与开发》课题成果之一、即将出版的“释江南丛书”作序，我写了下面一些文字。

一个词语——“江南”，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牵动历史、感发人心、富于美好的召唤意味。从20世纪80年代起，江南研究就逐渐成为一门显学。中外史学界关于区域史研究的新趋向中，最有突出成就之一的即是江南研究；近代社会转型与传统变迁研究的重要课题中，江南研究已成为最有深度与力度的领域；新文化史关于下层民众与下层社会生活史的重要开拓中，江南社会无疑也是其中富有成果、最具潜力的研究方向，而一系列新理论、新方法与新思想，也在江南研究中得到了不断深入的展现。人们越来越深地认识到：中国文化不仅历史悠久、博大精深，而且丰富多样、彼此差异；讲述中国文化，不但不能满足于用西方的方法与理论来套，更不能局限于用现代人现代的眼光来套，也绝不能停留在用中国古代几个现成的思想与观念来套，应该深入到地域的历史细节、社会场景、文化脉络甚至人物心灵中去感知体认。人们也越来越多地理解到：江南不仅只是一个地理上的概念，不仅只是一个经济上的概念，不仅代表一个先进的经济区，一个城市化程度很高的区域，而

且更是一个文化上的概念，一个深深涵盖了中国文化的丰富信息，在民俗、教育、艺术、美学、心理、政治、宗教等多方面具有浓度、深度与广度的文化概念。唯其如此，“江南”不止于“研究”、不止于学术的象牙塔、不止于传统，她面目清新，极富活力，延伸现代，广及民间，介入生活，化身为当代社会的话语与潮流、地域文明的遐思与梦语，艺术家的想象与创意，企业者的生产与广告，普通民众的享受与体验，城市文明的理想与召唤，当地居民的认同与情感，甚至文化中国的企想与建构等，这时，“江南”已经不再是一个普通的名词，而成了一大人文风景，成了文化资源的符号，成了新的“想象的共同体”，成为连结着思想与物质、精英与民众、虚拟与真实、传统与现代，以及美与真、善的重要论域与整体视界。“江南”区别于其他地域，我们至少可以提到以下几点：首先，因为长江天堑的特殊地理环境，江南长期与北方中原文化相对峙，既有政治军事的，也有经济与文化的，其他地域，没有这么直接、强烈与长期。其次，除了中原之外，江南是历代建都最多的地域，成为历史上第二个政治中心的所在，具有天然的政治地缘优势，因此长期以来集中了大量的人才与资源，是无可争议的华夏文明积累最为丰厚的地区。再次，在长期的对立与交流中，江南内化、同化、深含了中原文化，同时也发育生长了自身的特性，既与千年传统为一体，又有新的格局。譬如说，以大河流域为界，中国的地域文化，黄河流域的深稳厚重，珠江流域的清新开放，长江流域的江南，则兼有二者的长处。

然而，关于江南更多、更丰富的思想意味与文化内涵，仍有待于现代人的深入发掘。清代诗人吴梅村曾经 003

有一句诗：“世间何物是江南？”如果说古人已经体会到这个概念的重要与复杂，那么我们今天来理解更具有意味深长的现代意义。正是在这样的“江南”意味上，上海现代文化艺术研究所敏锐地感知了江南与中国文化、与中国当代有着更深细也更广阔的内在联系，他们组织了来自上海市委宣传部、市委党史研究室、上海历史博物馆、交通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东理工大学、上海大学等各方面对江南文化研究颇有造诣的专家学者，通过认真执著地检索历史资料，深入细致地实地、实物的调研，拿出了有理论、有实践、有传承、有前瞻、有创意、有见地的课题成果，在此基础上撰写了一套江南文化研究丛书，并经过长三角地区造诣很深、卓有成就的江南文化研究知名专家的评审，成就为现在这套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付梓出版的“释江南”丛书。经过检索，这套丛书，是迄今为止，在研究江南文化领域比较系统、比较全面、比较深入、比较前瞻的研究成果，为研究领域补充了相对比较真实详细的参考资料，也为对江南文化有兴趣的普通读者提供了比较有质量的读本。其中，《风泉清听——江南文化理论》提出一种特色鲜明的江南文化理论。正如作者所说，江南文化的诗性特质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以当下的江南研究主流话语为例，它们主要表现为以下形态：一是江南传统文献的整理与研究，二是以经济史和社会史为重点的历史学研究，三是更加实用的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研究。尽管这些研究各有所长，也很重要，但却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偏实证而轻人文”、“偏实用而轻审美”等倾向，作者明确提出，“江南文化本质上是一种以‘审美—艺术’为精神本质的诗性文化形态”。《振衣千仞——江

总序

王仲伟

南文化名人》从“遗民”、“山人”、“学人”、“红颜与帝子”等方面研究江南历史上的重要人物，把遗民归结为偏于“政治”的诗人政治家，把山人与学人概括为重在“审美”的诗人哲学家。这种划分类型突破了江南所谓“才子俊秀”、“白衣卿相”的主流人物模式，也贯穿了从诗性的视角理解江南的旨趣。而雨量充沛、气候潮湿、土地肥沃、河网纵横的地理环境，孕育了“饭稻羹鱼”、“桑麻遍野”、“粉墙黛瓦”、“舟楫代步”的江南民俗生活特色，形成了文化上表现的精细典雅，风俗上的清新宜人，江南工艺美术的秀美精致，长期的历史创造中，成就了委婉清丽的昆曲，甜美柔转的越剧、沪剧，珠圆玉润的评弹，唱出了细致、繁荣、感性的江南人的小康心境。云霓披霞的南京云锦、柔滑精美的苏杭丝绸、丝丝溢彩的苏州刺绣，渗透了江南女子柔美的气质。建筑、园林、雕刻反映江南人的智慧与灵巧……《水清土润——江南民俗》与《杏花春雨——江南文学与艺术》两部书，从下层与上层分别书写了江南文化创意的独特魅力和个性，更挖掘了江南文化背后的江南精神：好学善思、机智灵活的思维方式；与时俱进，融会贯通的文化态度；从容理性、开放兼容，敢为天下先的创造精神。这一切不仅是昨天的，而且是当下的，都可以在今天的江南城市与乡村生活中得到印证。最后，我们看到《繁枝有待——江南文化产业发展》更将此一套大书的眼光，从历史的回溯转而落脚于当下：宽厚包容的精神衍生出开放的文化心态，从而能够积极地应对全球化的文化挑战；重文尚柔的秉性，一方面促其谦让贵和、讲究诚信，从而与现代经济伦理相接通；另一方面也为文化产业注入了勃勃生机。至于江南生活的审美传统，更是江南文化

产业赖以开发汲取的源源不绝的源泉。江南之务实，使其不拘成法，锐意创新，与之一脉相承的进取与担当精神，加速了中国近现代化的进程，促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转型发展。所有这一切都表明，江南文化历史悠久而又指向未来，从而成为长三角文化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力源。

从《中庸》“南方之强”算起，“江南文化”已经有两千多年的时间了。透过这套丛书，我们分明可以看出，江南文化的双重身份越来越明显：一方面，江南意识与认同是由中原意识而形成的，离不开中原文化；另一方面它又区别于中原意识而存在。一方面植根于故土传统，另一方面又变化于时代新意。她最中国，又最走出传统中国。江南文化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一方面根据中国文化的基本原则推动了社会文化的发展，另一方面又跳出中原的局限，变革传统，打破成局，与时俱进地展开自身的文化创意。江南文化既有根源性的智慧、主体性的价值，又清新生动，有创造性、求新意的动力，这正是江南文化的特色所在。

我们看到一幅江南文化的大图景：从贫穷走向繁荣，从功利走向审美，从经济走向文化，从乡村走向城市，从累积走向开放，从对立、斗争、冲突走向和谐、人文、发展。这幅图景仍在活生生地继续着，未来中国，江南文化仍将是一个大的展示，是一个富有生机的创意。古人当初说：“当今赋出天下，江南居十九”¹、天下“扬一益二”²、“上有天堂，下有苏杭”³、“苏常熟，天下足”……今天我们看到，这些历代称赞江南的话语，正在以一种新的形式，在一种新背景中，获得新的生命。

006 江南文化精神绝不仅仅只是一种地方认同，而且正在成

为一种普遍的文化意义感，甚至连接着更大共同体的思想含义，是对于什么样的生活更好、更值得追求的现代主张。诗意与美学，生活与习俗，文化的个性与多样性，已经成为21世纪极其可贵的文明理想。过去的历史长河中，江南犹如一文化的深渊大藪，深深接纳了来自长江黄河两岸的荆楚文化、巴蜀文化、徽派文化、岭南文化、齐鲁文化、秦晋文化等，通过长时期的互相交流，冲突融合，在21世纪，最终在上海开埠后又与西方思想文化激荡冲突交融而成功对接。

因而，江南文化是开放的，她向着未来。

是为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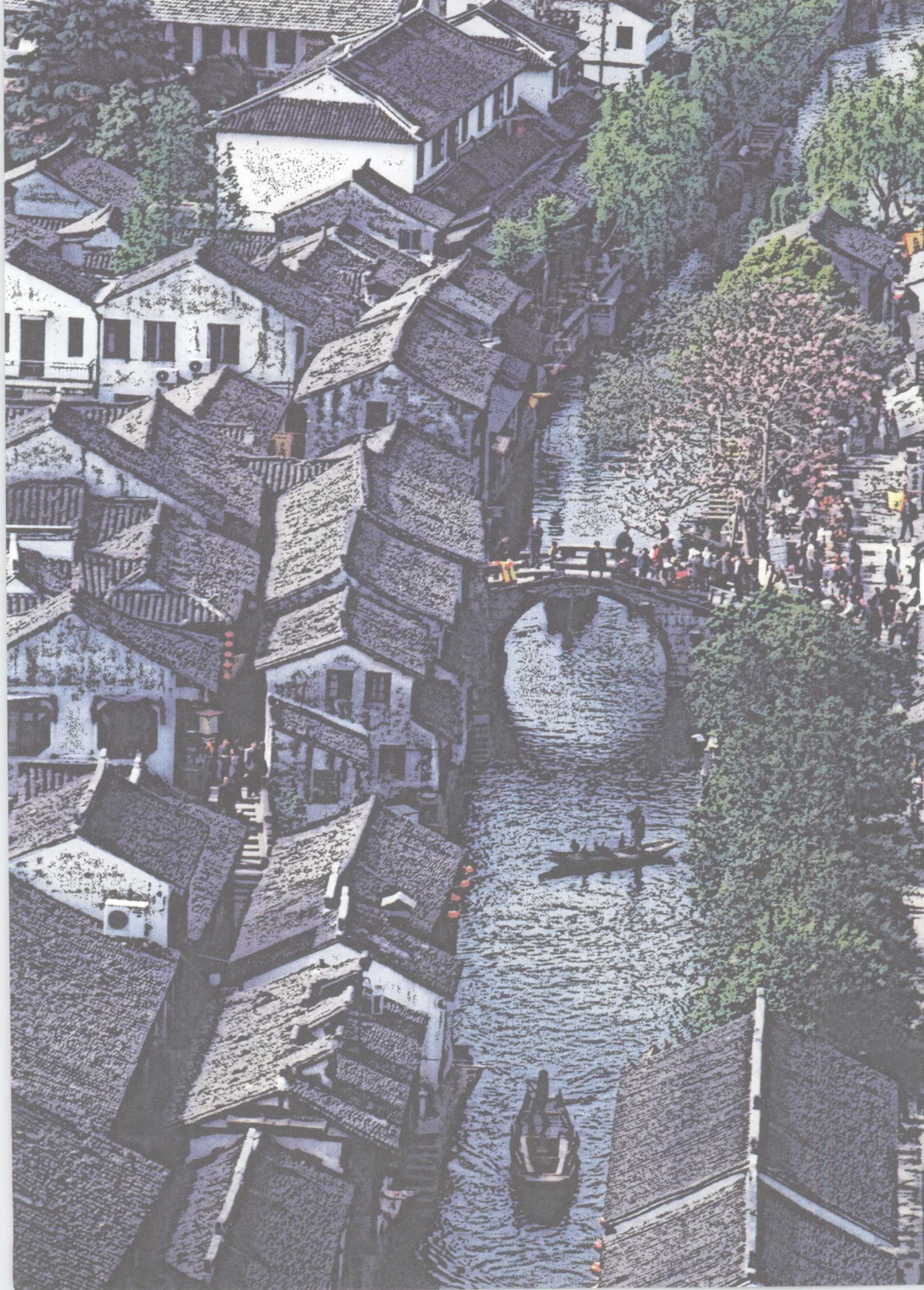
王仲伟

2010年1月1日

1 韩愈《送陆歙州诗序》。

2 洪迈《容斋随笔》卷九，《唐扬州之盛》。

3 范成大《吴郡志》卷五〇，《杂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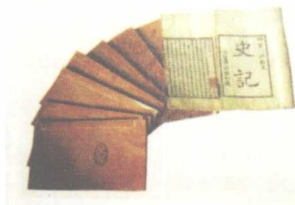
前言 江南与“为江南文化所化之人”

与其他形态的文化精神一样，江南文化的真精神也并不存在于抽象的概念演绎与使人周身不自由的灰色的理论体系中，而是直接地澄明于人的感性生存与实践活动中。如果真有什么生生不息的江南文化精神，那它决不是先验的、静止的或一成不变的，而是在一代代个体的生活中成就出来的。而江南文化名人就是江南文化精神真实的承载者与践行者，其核心是在普通的肉身和生活中真实表达出的江南诗性文化的灵魂和风度。

一、从符号到人物的学理进程

关于学术表达，刘梦溪先生将之分为两种方式：一是“借符号讲话”，“哲学家，特别是那种纯哲学家，他们往往用符号讲话。对他们而言，最重要的是范畴、概念”；二是“借人物讲话”，“因为历史是人物的活动，离开人物的活动，就无所谓历史”。一般说来，西方学者多使用符号讲话，而中国的学术与人物的关系更密切。西方学术在当下的强势地位，给我们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如梦溪先生指出：“现在学术界有一些年青人也愿意借符号讲话，但是由于准备不足而往往流于空疏。……这样的空疏之学，与其借符号讲话，还不如借人来讲话。”（刘梦溪：《学术思想与人物》）这两种话语方式，对于我们研究江南文化名人有重要的启示。

历史学家多以人物说话，这是世界的通则，但以中国历史著



清版《史记》书影

作最为典范。如钱穆先生指出：《尚书》、《左传》与《史记》，既是“中国史书中三个阶段，也是三种体裁。……《尚书》是记事的，《左传》是编年的，而《史记》是传人的，中国历史体裁不外此三种：事情、年代、

人物分别为主。一切历史总逃不过此三项。《尚书》是一件一件地写，写出就是一篇篇的《尚书》。《春秋》与《左传》是一年年地记载，而太史公的《史记》，就一人一人地写下”。（钱穆：《中国史学名著》）如果说《史记》是其中最好的，就不妨说以人物为中心是中国史学的秘密。至于为什么会这样，则与中国文化形态相关。与西方文化是理性文化相对应，我们把中国文化称为诗性文化。如果说，理性机能发达的西方人，最擅长的是以抽象的符号替代活生生的个体；那么对于诗性机能发育更为充分的中国人，则习惯于通过感性的声音、事件让生命自身直接到场。由此可知，“借人物说话”是中国特有的文化叙事方式，其基本特点可以归结为以感受含摄论证，以经验贯通理性，以细节建构本体，以人物澄明精神。它不仅与“借符号说话”在地位上完全平等，就其特别适应于中国文化经验而言，还有着直指本体、目击而道存等更上一层的特殊意义。一言以蔽之，江南文化精神并不存在于抽象的概念演绎与使人周身不自由的灰色的理论体系中。而是直接地澄明于人的感性生存与实践活动中。

世间万物，最复杂者莫过于人。“借人物说话”，一方面，不仅不比“借符号说话”简单容易，反由于“人情冷暖”、“人心叵测”与“人道沧桑”而难度系数更高。另一方面，由于



陈寅恪像

人物本身直接对应、参与甚至是决定着历史进程的复杂性，因而，“借人物说话”比使用符号、概念、推理等也可更直接地深入到文化与精神的底部。需要注意的是，仅仅以人物为中心是不够的。因为人是一个大概念，有希腊哲学的人，有中国儒家的人，有现代语境中非理性的人，也有后现代文化中的欲望主体，因而，在阐释江南文化精神时，必然要碰到以什么人为中心，或者说，什么样的、什么时代的、什么样性格的人，才是具有合法身份的代表。对于中国文化而言，如果“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者即陈寅恪所谓“为此文化所化之人”（陈寅恪：《寒柳堂集·寅恪先生诗存》），那也不妨将江南诗性文化理念与精神的历史承载者与创造者称为“为江南文化所化之人”。

二、江南文化主体与中国文化主体的关联与阐释

“为江南文化所化之人”，与中国文化主体既相关又有所不同。相关是因为他们都是中国文化生命的感性载体，不同则是由于南北文化之差异所导致。由此出发，就可以确定“为江南文化所化之人”的内涵。

关于中国文化主体，笔者先后提出过两种看法：一是《中国诗哲论》提出的诗人哲学家，以其代表着中华民族不同历史时期的高峰精神体验；二是《中国诗性文化》提出的诗人政治家，以中国诗性文化起源于古老的食物分配制度并始终未脱离人间的现世关怀等原由。前者主要是模仿西方诗人哲学家，在中国文化中并非主流；而后者从中国诗性文化及其历史深处拈来，具有普遍性意义。

一般说来，注重与无机自然界相区别的民族首先发育的类本质是思维能力，正如帕斯卡说人是一根会思想的芦苇那样；对于注重人与有机的自然界（主要是动植物）相区别的民族首先发展的则是人的伦理本质，正如孟子感慨的人与禽兽的差别极其微妙，以及荀子对此的重要补充：“人之所以为人者，非其二足而无毛也，以其有辨也。夫禽兽有父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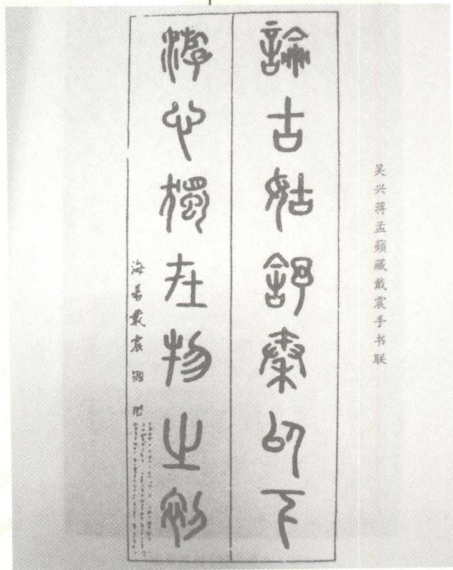
而无父子之亲，有牝牡而无男女之别。故人道莫不有辩”（《荀子·非相》）。所以说，与西方诗人哲学家通过理性思维区分人与无机的自然界截然不同，中国诗人政治家则是通过“礼”的内在建设，以区别开人与禽兽的方式从原始混沌中生长出来的，因此它最为关注的正是人的政治属性与伦理本质（汉语中的“礼”恰好具有这样两重涵义。）……这是一切中国文化中一切社会性活动的逻辑起点，所以说中国文化主体在本质上正是一种诗人政治家结构。（刘士林：《千年挥麈》）

由此引申，尽管西方哲学发展到康德也开始“紧紧地抓住主体”，但由于理性文化与诗性文化、理性主体与诗性主体的差异，与康德那种建立在思辨基础上、难以把握、“与经验无关”的先验主体完全不同，以个体的感受、欲望与心理状态为基础在直观与当下生成的诗性主体，则异常的活泼清新、毫不生涩艰深，并同样能达到高深的境界。人物如此，叙事从之。如钱穆先生说：“中国古人讲人生，特点正在如是般浅近，不仅是大家懂，而且大家正都在如此做。由此基点，再逐步推到高深处。因此其所说，可成为人生颠扑不灭的真理。”（钱穆：《中国思想通俗讲话补篇》）

江南文化主体发源、成长于中国诗性文化的大背景下，首要特征是与西方理性主体的截然不同，但由于“江南诗性文化”与“北国诗性文化”在形态与发展上的差异，“为江南文化所化之人”还成就了十分独特的个性与风貌。具体说来，一方面，“审美”与“政治”的区别，是诗性主体分为南北二形态的主要根源。以学者为例——

由于现实生存条件恶劣，北方学者多关注国计民生，在学术生产上，也多持“述而不作”的态度，容易保守与守成，而于思想解放

戴震手迹



与学术创新上显得不足。在生活方式上也如此，他们一般都能严格遵守礼法与规范，以至于常常显得拘谨与呆板。与之相比，江南学人则要自由、开放许多。不少江南学者都很有个性，并表现出江南学人特有的优雅气质。如与孔子同时的季札，自然通达，博学清言，就是一例。……如果说北方学人的最大特点是功利性，那么江南学者则更多地体现出非功利的审美品格。这以文学上的表现最明显，如《北史·文苑传》说：“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由于个性与思想比较解放，在江南地区，既容易出现戴震那样的“怀疑论者”，顾炎武那样的“职业化学者”，也会经常出现李贽一类的异端人物。（刘士林：《国学与江南文化刍议》）

另一方面，这并不意味着“审美与政治无关”，由于精神的互渗律与文化的渗漏现象，江南与政治的关系往往显得更加复杂与微妙，并具体表现在“政治之后是审美”这一中国诗学的基本原理中——

一方面，由于中国民族的异化性力量主要来自现实世界中制度化的伦理政治符号，要追求审美自由则意味着个体必须要最大限度地超越这些羁绊，因而它在逻辑上提出的一个要求就是回归自然、乡村或朴素的生命状态中。但另一方面，对于诗人来说，这两种要素之间的关系又是相当复杂的，不仅没有经过伦理政治意识提升的个体感情在本体内涵上总是缺乏深度，而且没有切肤之痛之现实体验的种种吟咏性情也难免有“纸上得来终觉浅”之讥，因而它在逻辑上也就提出了与前者完全相反的要求，即“审美（形式）不能脱离政治（内容）”。总结一下这既相互缠绕又激烈矛盾的两方面，或者说要正确对待与满足这两方面的要求，最关键的问题则在于如何在两者之间找到一种平衡，在防止它们各自走向极端的独断论的同时，把那种真正有深度与现实感的诗性思